



#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网络意见领袖发挥 正向作用的影响因素探究

庞妃<sup>1</sup>, 白杨<sup>2</sup>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桂林 541010; 2.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桂林 541004)

**摘要:** 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意识形态舆情演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探究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影响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向作用的因素, 在前期深度访谈得出的重要因素基础上提出有关假设, 并运用 SPSS26.0 统计分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 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对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产生显著的影响, 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道德想象力、舆论引导能力的高低对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具有差异影响。该研究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舆情; 正向作用;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10-0597-10

## An exploration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opinion leaders' positive role in online ideological security

PANG Fei<sup>1</sup>, BAI Yang<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1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Online opinion leade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ideological public opinion.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online opinion leaders in safeguarding online ideological security, this study proposes relevant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factors obtained from previou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ests them using SPSS26.0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entra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position of online opinion lead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of online ideology. The levels of risk percep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bility of online opinion leade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of online ideolog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less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yber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online opinion leaders; online ideological security; online public opinion; positive role; influencing factors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sup>[1]</sup>随着智媒技术的迅猛

发展,网络空间已演变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多元价值博弈的最前沿。相较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

收稿日期:2024-04-14

基金项目:广西统一战线智库 2025 年度招标课题(ZKYB202510);广西高校统战理论政策研究课题(2025GXTZ025);广西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5KY0229)

作者简介:庞妃(1993—),女,广西玉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白杨, E-mail:1659335527@qq.com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风险概率倍增、爆发频次激增、影响能级跃升的显著特征,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最富复杂性且最为紧迫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一。网络意见领袖作为影响网络信息传递与舆论话题导向的重要主体,在引导网络政治舆论、调控意识形态舆情、扩散网络主流思想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争论问题,习近平指出:“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展现正能量。”<sup>[2]</sup>争取网络意见领袖助力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有必要从网络意见领袖自身行为视角出发,明晰影响其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正向作用的重要因素,使其释放出“最大正能量”,以帮助化解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利益冲突,规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蔓延,正确引导主流思想舆论,提升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有效性。

纵观国内关于网络意见领袖正向作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政治生活<sup>[3]</sup>、思想政治教育<sup>[4]</sup>、网络舆情<sup>[5]</sup>等视角。相关研究认为,在信息化社会,网络意见领袖以其强大的舆论动员力和舆情引导优势,善用和慎用自身话语权,促进正面网络舆论宣传,有助于我国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升<sup>[6]</sup>;作为网络信息的关键节点,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演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在阻断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中发挥正向作用<sup>[7]</sup>。总体来看,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视角,探讨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向作用的研究较少,亟需取得新的突破。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当前网络信息环境,考察网络意见领袖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正向作用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拓宽网络意见领袖研究提供思路,同时为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 一、基本概念

### (一)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是活跃在网络场域的“意见领袖”,是“洞悉域内网络传播机理的接口”<sup>[8]</sup>。在网络传播时代,互联网媒介环境与数智平台赋予网络意见领袖更为广阔的活动场域。网络意见领袖依托开放的数字环境和高效的传播渠道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半径,同时凭借高频次、高质量的言论输出强化其传播效能,逐步确立其在网络舆论场中的引导者地位。然而,互联网并非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而是意识形

态斗争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活跃于此的网络意见领袖更是网络意识形态信息价值认同的塑造者。网络意见领袖深谙网络意识形态信息传递规律,占据网络意识形态信息扩散重要节点,运用恰当语言娴熟地解读关键信息,表达独到见解,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认同。作为推动网络舆论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发展成意见、意见汇聚成舆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其影响力贯穿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全链条。

其一,网络意见领袖是网络意识形态信息传播方向的“引导者”。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第四媒体”的广泛普及,互联网构建了几乎不受时空限制的虚拟场域。在此场域中,网络意见领袖表现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社会热点事件、重大问题的辐射和追踪能力人所皆知。美籍以色列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指出:“意见领袖拥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是价值功能的表达者。”<sup>[9]</sup>相比于草根阶级这一“沉默的大多数”,网络意见领袖处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是网络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的活跃分子。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基于自身独到的专业视野以自由式辩驳替代冲突偏颇,用理性分析取代情绪宣泄,整合民众讨论的零散和碎片观点。在注意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民众往往借助网络意见领袖的专业化解读和权威性观点来理解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凭借较高的信息汇聚优势、发散活跃的思维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在网状分布、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中推动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再中心化”,在网络场域影响民众讨论的方向。在此情况下,当网络意见领袖传播的意识形态信息与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相背离时,将导致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真实性产生认知偏差与心理抵触,进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反之,当网络意见领袖传播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符合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时,则会提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其二,网络意见领袖是将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发展成意见的议题“设置人”。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将信息传播的权力分散至不同群体之中,但大部分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议程或议题的设置权往往被极少数知识精英所掌控。网络意见领袖凭借个人魅力和专业见解,使其发表的言论和意见在网络场域产生“虹吸效应”,得到民众

不断关注、转发、评论,随之大幅提升其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和公信力。虽然网络意见领袖不能直接控制民众对某个事件或观点的具体看法,但他们可以提供必需的信息或者设置相关的网络议题或议程,有效影响民众所关心的事实和讨论问题的次序<sup>[10]</sup>。特别是在重大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网络意识形态舆情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向民众呈现讨论的网络意识形态议题,其发表的言论或意见更容易赢得民众的关注并引发激烈的讨论。当网络意见领袖的议题设置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向时,将有效增强民众政治认同;若二者相悖,则会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消解作用。

其三,网络意见领袖是将意见汇聚成网络舆论的“推动员”。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或意见因其“名人效应”会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继续关注正在讨论的话题。在现实社会中有这样一条法则:在网络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大部分民众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搜索自己信任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或言论,从而对整个事件形成总

体的基本认识;之后他们会持续地关注此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跟踪事件发展过程。在民众的优先关注和持续讨论中,网络意见领袖凭借流量规模在舆论环境中获得一定的网络话语权,对小众观点与意识造成一定程度的压迫,在意见汇聚成网络舆论中具有推动作用和引导地位。随着网络话语权的积累,网络意见领袖逐渐具备了参与并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教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体现在其话语影响力上,也反映在其价值引导作用中。具体而言,网络意见领袖依靠话语修辞的吸引和劝服功能,使带有某种特定价值倾向的言论或意见获得民众的高度认同,并运用多种叙事方式进行情感表达与宣传动员,推动形成网络舆论,进而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

综上所述,网络意见领袖是指在互联网平台针对社会敏感话题或热点事件传递网络信息、发表独到意见,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引导网络舆论发展态势的个人或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的内涵和角色功能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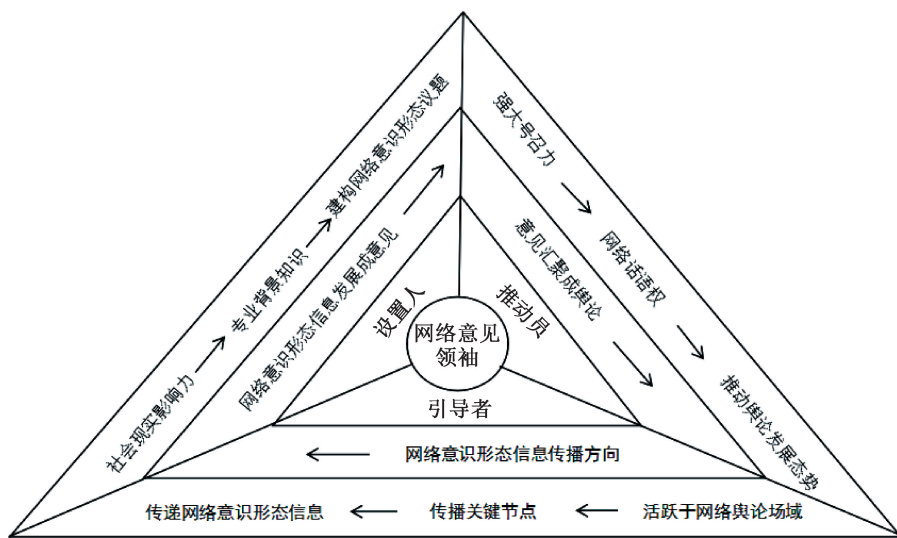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意见领袖的内涵与角色功能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新征程,要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必须保证国家安全,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则是其中的关键要害所在。”<sup>[11]</sup>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免受内外威胁,维持相对稳定与协调的持续状态及保障能力。意识形态安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维护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精神防线、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也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居于战略性、全局性地位。作

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意识形态,其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大战略议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虚拟空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与入侵,引领互联网各种思潮和舆论发展态势,且不受其他意识形态侵蚀与威胁的稳定状态。

首先,从国家执政要求来看,国家执政需要稳定

的社会环境,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正是维护这一稳定和支撑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空间,各种思潮和观点相互碰撞,如果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不稳定,进而威胁到国家执政的基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它体现了国家对互联网场域中多元思潮与意识形态的治理效能,特别是在应对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维护主流价值体系方面的防御能力。这一安全范畴的核心在于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导权体系,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传播生态中的引领地位。

其次,从社会基础来看,现实社会是意识形态的土壤和根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互联网场域,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力依赖于网民的认同和支持,而网民的认同和支持又源于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文化理念的认知和信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较高的认同感,网络舆论环境氛围活跃且和谐有序,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文化理念等意识形态因素得到持续发展,不受外部干扰和内部破坏的稳定状态。

最后,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性质和功能来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占据主导地位,保持其稳定性、凝聚力和引领力,有效抵御外部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干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的一种状态和能力。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网络空间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全方位主导着网络舆论场域的话语建构、网络文化产品的价值导向以及网络社交平台的互动规范,充分发挥着其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整合、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创新性的网络化表达和传播方式,持续强化其在思想领域的解释力、引导力和掌控力,能够有效应对多元思潮冲击,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综合考量网络意见领袖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期深度访谈获得的原始资料,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饱和度检验,笔者提炼出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舆论引导能力是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sup>[12]</sup>,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 (一)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影响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英国研究者拉什等<sup>[13]</sup>指出,风险认知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反思性判断。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是网络意见领袖感知网络场域的显性与隐性意识形态风险要素所需的知识储备,包括对国家、社会、他人和自己可能造成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判断。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信息异化导致风险的隐蔽性更强、防控难度更大。网络意见领袖作为参与、引导和左右网络舆情的“信息富有者”,需凭借其独特的信息优势,并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与价值判断,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进行选择、甄别、加工与阐释,才能从信息迷雾中“杀出重围”<sup>[14]</sup>。网络意见领袖凭借自身风险认知能力来识别风险性质、分析风险倾向与风险研判,成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因素。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1: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 (二)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影响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是指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占据社交性传播网络意识形态信息的位置程度,主要包括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两方面。有研究发现,网络意见领袖位居网络场域话语权力高层,具有较强的信息整合运用能力<sup>[15]</sup>。他们能以感性话语、理性术语解读网络事件,影响网络意识形态走势。网络意见领袖处于不同的网络传播位置,影响其获取和识别网络信息的机会。处于优势的网络传播位置能有效帮助网络意见领袖获取网络空间资源、探索有价值的信息。在程度中心性上,若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能够占据传播中心位置,则意味着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较高,维持的直接网络节点关系数量较多,由此可为民众共享网络信息,带来规模效应<sup>[16]</sup>。在中介中心性上,处在传播中心和信息源汇合点的网络意见领袖具有较高的权力与声誉,预示着其对网络信息互动的控制能力更强,更易甄别与传递各样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即,处于网络传播中心位置的网络意见领袖在引导网络意识形态舆论中拥有大量的权力和声望<sup>[17]</sup>。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越高,越有利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 (三)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影响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道德想象力“不仅包括对他人情感、情绪、思想和境况‘感同身受’的‘移情共感’维度(一种超越性情感),还包括敏锐地把握潜在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可能给他人带来损益的后果想象,以及蕴含着追求突破情境界限的创造性想象”<sup>[18]</sup>。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是网络意见领袖“感同身受”地为舆情利益相关者的境况着想,在特定境况中创造性地探索解码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的多种可能性,并以周全、负责的态度确定最佳意见表达的实践理性能力。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基于“视力”前瞻性地预见行为后果,是其富于情境性、创造性意见形成的基础条件,也是其作出正确行为决断的有效保证。网络意见领袖面对复杂的网络意识形态舆情时,凭借道德想象力能够找到更贴近现实境况的意见表达新方式,对舆论引导具有强烈的实践关切和清晰的行动指向。有研究发现,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网络意见领袖是否拥有丰沛的道德想象力,影响其能否成为民众合理表达政治诉求的代言人与理性建言献策者<sup>[19]</sup>。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越丰沛,越有利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 (四)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影响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是指网络意见领袖通过提供网络信息和调整价值观念,使民众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与有效互动,进而维持和促进网络舆论良性发展的平衡能力。网络意见领袖对民众舆论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引导能力,能对民众意见开展定向的塑造与影响,对网络舆论演变运行进行平衡和协调。当面对偏激化的高涨舆论时,若网络意见领袖缺场失声,不能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成为“沉默的螺旋”的一员,就会导致网络舆论场坍塌,致使“小事拖延,大事拖炸”问题的出现<sup>[20]</sup>。因此,作为网络传播的关键节点,网络意见领袖能够依托其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引导舆论走势,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有研究者从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度、影响力、认同度和自塑力四个方面分析发现:网络意见领袖作为舆论发展过程的关键节点,能站在信息发布的制高点上对网络舆论引导过程发挥重要导向作用<sup>[21]</sup>。由此,本研究提出第四个假设:

H4: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越科学,越有利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样本

微博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传播对象为不确定的陌生受众,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公开性,社会反响比较强。在微博空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注更加趋向于兴趣,所形成的社交圈属于弱连接关系,有助于用户打破固有的交际圈层,获取不同领域的资讯。鉴于此,为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提升内容的丰富性和确保客观真实性,本研究在访谈的32位微博空间网络意见领袖的受众中随机选取630名粉丝,发放调查问卷,获取相关研究数据。

### (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遵循两方面原则设计初始调查问卷,以保证样本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部分变量测量题项源于公开发表的论文,且有研究者已运用过这些问卷调查的有关变量,信度与效度较高;另一方面,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以及变量测量题项内容进行科学评价,共计咨询相关领域专家10人,其中具有教授职称8人,副教授职称2人。在研究团队内部实施问卷预测试,系统评估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题项表述的准确性。基于预测试反馈,重点修订表述模糊、语义歧义或逻辑不清的条目,通过多轮修订和优化,确保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 (三)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模型共包含5个潜变量: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舆论引导能力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的效果。每个潜变量有4~5个测量题项,除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是根据参考文献以及本研究前期深度访谈自行设计外,其余各测量题项均参照前人有关研究作出适当调整,最终形成本研究所需要的调查问卷。本研究各测量题项均以李克特五点式量表进行总体评分,分别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设置5个选项,予以1、2、3、4、5计分。变量与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

## 四、结果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3年12月15日至12月31日。问卷主要针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粉丝,以留言、电子邮件等形式发放,共计发放630份调查问卷,最终收回346份调查问卷,剔除回答不完整、有误、前后矛盾的19份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27份。

由于网络空间被调查者对调查者完全陌生,部分被调查者收到邮件后不予回复,导致本次调查问卷回收率较低,但网络空间被调查者回答问卷的信息针对性很强,调查题项与其自身情况较为吻合,所以调

查问卷有效率较高。从本研究样本性别分布情况来看,男性 198 人,女性 129 人。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特征分布大致符合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所显示的结果。

表 1 变量与测量题项

变量	测量题项	测量依据
风险认知水平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认清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复杂形势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对社交媒体中传播的反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进行批判和证伪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风险发表各种言论和意见 网络意见领袖在意识形态信息安全现象与外部联系方面有科学认知与判断	文献[22-23]
传播位置中心性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得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信息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能够快速获得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信息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经常关注民众所转发、评论或传播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信息 网络空间很多人通过网络意见领袖能够获得相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信息	文献[17, 24]
道德想象力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敏锐地察觉他人的需要、诉求与现实处境 网络意见领袖与他人交往,能够设身处地理解和感受他人的需要、思想及情感,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慎重思考意见表达对民众价值认同的不确定性影响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协调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着力化解网络意见表达的利益冲突 网络意见领袖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及时反思,以负责任的态度选择最为恰当的行动方式	文献[25]、本研究
舆论引导能力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网络舆情的生成和潜在发展趋势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坚定不移地践行党性原则,发挥好、维护好、实践好党和人民的喉舌职能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运用信息手段影响民众对网络议题的关注方向与程度 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对分散意见和态度进行整合,形成意见的和谐共振	文献[26]、本研究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的效果	网络意见领袖为民众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提供新的信息 网络意见领袖巩固了民众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原有想法和态度 网络意见领袖使民众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看法和观点从模糊变得清晰明确 网络意见领袖改变了民众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原有想法和态度 网络意见领袖对民众最后是否参与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讨论或评价具有很大影响	文献[27-28]

## (二)量表信效度检验

问卷信效度检验是保障调查工具科学性、数据可靠性和结构合理性的关键环节与必要前提。

a)信度分析。本研究问卷信度的检验主要采取内部一致性展开判断,以 Cronbach' $\alpha$  系数来检测量表题项,在计算总量表信度  $\alpha$  系数基础上,也对各个分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总量表  $\alpha$  系数为 0.934(>0.8),说明调查问卷设计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中的风险认知水平分量表、传播位置中心性分量表、道德想象力分量表、舆论引导能力分量表的  $\alpha$  系数均在 0.8 以上(分别为 0.937、0.852、0.943 和 0.902),反映出很好的信度,表明本研究关于网络意见领袖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正向作用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可信度与稳定性。

b)效度分析。本研究中的问卷量表在设计和完善阶段,均在文献查阅和相关领域专家指导意

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保证了量表整体内容的效度。本研究主要采取因子分析法对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展开分析,选择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测进行检测。根据检测得出 KMO 值为 0.895(>0.8),说明该数据适合展开做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正交旋转,萃取共同因子。首先,以特征根(>1)为目标进行提取,最终获取 5 个因子,与本研究模型中的 5 个潜在变量相互对应,且因子累计总体方差为 78.475%,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接着,通过最大方差法(Varimax)旋转后发现同样属于一个变量的测试题项,其最大载荷具有聚集性。即变量的测试题项在对应因子中具有最大载荷(>0.5),不存在横跨因子现象。这表明本问卷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科学把握变量关系的方

向、影响程度和紧密度。本研究采用 SPSS26.0 软件中的逐步回归分析,对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的影响关系进行验证。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与方差分析结

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调整判定系数(Adj.  $R^2$ )值为 0.409,解释了总变异的 40.9%。从模型 1 至模型 4 的  $F$  值的显著性概率(Sig.)看出,每个模型的 Sig. 值都小于 0.01,表明模型 1 至模型 4 的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表 2 逐步回归模型总体参数与方差

模型	复相关系数 $R$	判定系数 $R^2$	调整判定系数 Adj. $R^2$	$F$	Sig.
1	0.576(a)	0.435	0.433	39.265	0.000
2	0.544(b)	0.427	0.424	38.005	0.000
3	0.731(c)	0.687	0.632	91.366	0.000
4	0.532(d)	0.421	0.409	37.083	0.000

注:a 自变量:[常数项]——传播位置中心性;b 自变量:[常数项]——传播位置中心性、风险认知水平;c 自变量:[常数项]——传播位置中心性、风险认知水平、道德想象力;d 自变量:[常数项]——传播位置中心性、风险认知、道德想象力、舆论引导能力;因变量: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从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系数检验表 3 看出,每个解释因子的 Tol 值介于 0.806~1,VIF 值介于 1~1.241,表明本研究逐步回归模型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常数项显著性概率(Sig.)为  $0.000 < 0.5$ ,说明常数项与 0 具有显著差别,应当出现在逐步回归方程之中。

表 3 逐步回归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系数检验结果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t$	Sig.	共线性诊断	
		B	Std. Error				Tol	VIF
1	常数	2.314	.176		9.127	0.000		
	传播位置中心性	.348	.057	.343	9.025	0.000	1.000	1.000
	常数	2.226	.252		8.913	0.000		
2	传播位置中心性	.293	.055	.292	8.723	0.000	.889	1.125
	风险认知水平	.246	.068	.219	8.115	0.000	.889	1.125
	常数	2.159	.216		7.819	0.000		
3	传播位置中心性	.267	.054	.245	6.919	0.000	.814	1.229
	风险认知水平	.235	.062	.324	6.862	0.000	.843	1.205
	道德想象力	.212	.057	.317	6.109	0.000	.852	1.173
4	常数	2.004	.209		6.032	0.000		
	传播位置中心性	.268	.056	.226	5.976	0.000	.806	1.241
	风险认知水平	.231	.061	.321	5.853	0.000	.835	1.198
	道德想象力	.226	.058	.318	5.625	0.000	.842	1.188
	舆论引导能力	.211	.052	.309	5.291	0.000	.856	1.168

从逐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因素顺序看,传播位置中心性最先列入模型,表明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风险认知水平,然后是道德想象力,最后是舆论引导能力。从本模型的  $t$  检验可以看出,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 0.01 水平上。从显著性概率(Sig.)可以得出,常数项与 0 有显著差别,应当展现在逐步回归方程上。按照回归系数的正负值可以综合判定,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与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具有正

向关系。本研究运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四大因素共同影响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传播位置中心性、道德想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对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的影响。通过理论假设与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正向显著

影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其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正向作用效果越强。在即时传播、匿名表达与碎片化传播交织的网络舆论场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具有典型的“灰犀牛”特征。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节点,具有较高风险认知水平的网络意见领袖不仅掌握信息编码与解码的传播规律,更能运用话语创新对关键信息进行创造性解读,从而强化民众的主流价值认同。这类网络意见领袖兼具风险预判能力与危机应对智慧:既能洞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机理,又可精准研判潜在风险态势,由此实现更高效的价值引领作用。这与胡登全<sup>[29]</sup>所指出的“只有个体习性中具有了风险意识和良好的风险应对能力,才能把制度安排贯彻到行动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治理风险”的观点基本一致。

二是,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正向显著影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因素与其他三个因素相比,影响最为显著。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位置中心性越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获取越充分,作为网络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纽带的功能越明显,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正向作用效果也越强。居于网络场域核心地位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发表重要言论和意见吸引大量民众参与集体讨论,影响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传递与扩散。这与芦何秋<sup>[30]</sup>所提出的网络意见领袖“在控制网络信息互动中所处的位置越关键,其对某部信息互动传播的控制程度越高,在信息互动传播中的权力越大”的结论基本一致。

三是,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正向显著影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研究表明,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水平与其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效能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想象力越丰沛,其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网络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力在现实资源和虚拟资源的有效转化上显现出巨大优势,其意见表达是网络意识形态舆情发展的重要推力。网络意见领袖在意见构思时全面考量意见的意向性问题,不仅关注网络意识形态舆情极化后自身提出意见的责任后果,还预见意见在何种程度、怎样影响民众的价值取向。此外,在网络意识形态舆情陷入认知困境时,具备丰沛道德想象力的网络意见领袖能够突破固有表达范式,建构既超越现实局限又契合实践逻辑的新型话语框架与行为范

式。网络意见领袖通过道德想象力彰显出的意见意向性、话语高辐射力和高到达率、行为方式超越性,使得自身的道德责任、伦理行为和社会担当等方面特性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明显差别。这与杨慧民等<sup>[19]</sup>所指出的网络意见领袖道德想象力有助于建构道德自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化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结论一致。

四是,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正向显著影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越科学,其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正向作用效果越强。这与薛宝琴<sup>[31]</sup>所指出的观点基本一致,即积极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在关乎意识形态建设、社会发展、公平正义、民生等焦点问题形成舆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引导网民理性参与。具备主流价值观念的网络意见领袖既能有效抑制负面舆情扩散、抵御错误思潮渗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又能通过理性辩论驳斥不实言论,基于客观分析引导舆论走向。因此,增强其科学引导能力,充分发挥其在舆情调控和价值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十分重要。

## (二)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网络意见领袖作为网络空间价值引领的重要主体,必须建构以政治意识为统领、多元价值要素协同支撑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一体系要求网络意见领袖增强五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要求网络意见领袖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等根本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二是平等意识,要求打破“意见垄断”思维,通过构建主体间性对话机制实现与广大民众的真诚沟通,既要避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也要防止盲目迎合的庸俗倾向;三是服务意识,强调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既要精准传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善于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建设性意见,实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良性互动;四是问题意识,要求以辩证思维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既要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又要有分析问题的深刻性,更要有解决问题的创造性;五是慎独意识,强调通过持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这五种意识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形塑网络意见领袖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正向作用发挥的价值坐标和实践路径。

二是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中,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作为网络传播生态中的关键节点,网络意见领袖深刻影响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格局:在信息传播层面,依托其网络中心性位置,通过议题建构和框架设置引导舆论走向,实现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在危机应对层面,凭借信息加工和扩散优势,能够快速响应舆情事件,阻断非理性信息传播链;在长效治理层面,通过常态化互动形成稳定的价值传导机制。基于此,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应当构建系统化的协同治理策略: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对话合作机制,将其纳入网络治理共同体,在重大网络意识形态舆情事件中形成“预警—响应—化解”的全流程协作;另一方面要完善正向激励机制,通过专业化培训和政策支持提升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素养和数智素养,使其真正成为网络空间主流价值的传播者、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守护者。这种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势能,又能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创新路径。

三是从政治引领和能力提升两个维度着手,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与引导。其一,党政部门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引领。即要多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并向其传递国家政策精神、内容与实施方案,以帮助网络意见领袖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不断提升其政治观念、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同时,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意见领袖开展表达话语和意见的活动。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意见领袖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意见表达的基本准则,推动他们发展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事务参与者和利益守护者,从而有效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升风险治理效能。其二,要注重网络意见领袖的能力提升。首先,提高网络意见领袖的风险防控力,规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网络意见领袖应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预警观,科学把握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危险与存在的威胁,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源与风险点的分析研判与动态监控。其次,培育网络意见领袖的道德想象力,化解网络舆情利益冲突。网络意见领袖应从整体视域出发,建构合宜的话语规范,清醒认知自我言行,遵循网络道德规范,理性审视自我意见表达的行为后果,协调网络舆情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从而探寻最佳的网络意见表达方式。最后,增强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力,提供网

络舆论发展的参照系。网络意见领袖要围绕民众切身利益和党政中心工作精心设置议题,聚焦社会关切,反映民众呼声,开展正面宣传,熟练使用社交网络的多模态语言和多模态传播方式,增强对话意识和话语权意识;还应紧密追踪舆情变化发展生命周期,配合网络舆情演化做好积极应对工作。

四是构建科学完善的网络意见领袖协同治理体系,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的重要制度保障。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引导—激励—评估”三位一体的动态管理机制:首先,健全正向激励机制。通过设立“网络正能量传播奖”等专项表彰,对在舆论引导、舆情调控等方面表现突出的网络意见领袖给予物质奖励和荣誉激励,形成示范效应。建议建立分级分类的奖励标准,对在不同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网络意见领袖实施精准激励。其次,构建多维评估体系。建立包含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机制:官方维度,重点考察其政治立场和主流价值传播效果;社会维度,通过大数据分析网民反馈和舆情影响;学术维度,组织专家对其传播内容和方式开展专业评估。实施“三定”跟踪模式,即定向跟踪重点领域意见领袖言论、定期开展效果评估、定段进行发展诊断。最后,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意见领袖数据库,实时监测其发展态势,根据评估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对表现优异的网络意见领袖加大扶持力度,对存在风险者及时约谈引导,对违规违法者依法处置,形成奖惩有度的动态机制。此外,还需建立常态化培训体系,对网络意见领袖定期组织政策法规、传播技巧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6.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5.
- [3] 周莉,郭瑜鸾,胡珀. 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话语的分野与互动:基于232位微博意见领袖的探索性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2,44(7):97-117.
- [4] 陈永峰. 从围观到行动 从被动到主导: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5):155-160.
- [5] 刘迪,张会来. 网络舆情治理中意见领袖舆论引导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探析[J]. 现代情报,2020,40(9):144-155.
- [6] 雷跃捷,李智. 发挥好网络意见领袖的社会政治作用[J]. 人民论坛,2016(15):64-65.
- [7] 季丹,郭政. 网络意见领袖对危机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杂志,2015,34(2):22-27.
- [8] 朱天,张诚,齐向楠. “圈子”概念下网络意见领袖的本土化致思:

- 基于虚拟社区“百度贴吧”的实证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3): 131-136.
- [9] Katz E. 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An up-to-date report on an hypothesi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7, 21(1): 61-78.
- [10] 周宇豪. 政治传播学[M] 2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2: 106-107.
- [11] 刘晓哲. 新安全格局视域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维度[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8): 4-16.
- [12] 杨慧民, 白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向作用的影响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4): 92-101.
- [13] 拉什, 王武龙.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 52-63.
- [14] 杨慧民, 陈锦萍. 网络意见领袖建构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理路及其应用[J]. *理论导刊*, 2022(4): 53-58.
- [15] Galaskiewicz J. Exchange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43.
- [16] Stephenson K, Zelen M. Rethinking centrality: Methods and examples[J]. *Social Networks*, 1989, 11(1): 1-37.
- [17] Ho V T, Wong S S, Lee C H. A tale of passion: Linking job passion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 to employee work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1): 26-47.
- [18] 杨慧民, 王前. 道德想象力: 含义、价值与培育途径[J]. *哲学研究*, 2014(5): 104-109.
- [19] 杨慧民, 陈锦萍. 网络意见领袖道德想象力: 内涵、特性及其价值[J]. *学术界*, 2020(6): 140-148.
- [20] 徐世甫. 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缺场生成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11): 30-37.
- [21] 谢新洲, 杜智涛. 网络意见领袖舆论引导能力的评判体系研究: 基于灰色统计与层次分析法的模型构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15): 20-26.
- [22] Cases A S. Perceived risk and risk-reduction strategies in Internet shopping [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2002, 12(4): 375-394.
- [23] Webster F E. New product adoption in industrial market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69, 33(3): 35-39.
- [24] Gresov C, Stephens C. The context of interunit influence attemp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 38(2): 252.
- [25] 郭强, 郑富兴. 道德想象力的形式之维[J]. *当代教育科学*, 2022(4): 10-19.
- [26] 蒋晓丽, 侯雄飞. 舆擎中国: 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力提升方略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94-199.
- [27] Bansal H S, Voyer P A. Word-of-mouth processes within a services purchase decision context [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00, 3(2): 166-177.
- [28] Gilly M C, Graham J L, Wolfinger M F, et al. A dyadic study of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search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8, 26(2): 83-100.
- [29] 胡登全. 风险传播的场域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36.
- [30] 芦何秋. 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研究: 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75.
- [31] 薛宝琴. 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 165.

(责任编辑: 陈丽琼)